
京师同文馆博物馆考略

Research on the Museum of Capital Tung-Wen College

陈 为

Chen Wei

内容提要：

京师同文馆是为培养掌握外语和西方科学技术等方面知识的新式人才而设立的，是洋务运动时期设立的最重要的新式教育机构。京师同文馆具有近代高等教育的性质，其于1876年设立了辅助教学的博物馆。该博物馆是中国最早的国有官办性质的博物馆，也是中国最早的高校博物馆，其诞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形态中，因而也具有鲜明的过渡阶段的特征。

关键词：

京师同文馆 博物馆 丁韪良

ABSTRACT:

Capital Tung-Wen College was a very important new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which established during the period of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It was set up for training new talent who master foreign language and western scientific knowledge. Capital Tung-Wen College had the character of modern higher education, and for the purpose of teaching assistant it established a museum in 1876. This museum is the first government owned museum and also the earliest university museum in China. It was born in the semi-colonial and semi-feudal society, so the museum had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nsitional stage.

KEY WORDS:

Capital Tung-Wen College; Museum; Martin W.A.P

目前博物馆界一般认为张謇于1905年创办的南通博物苑是中国第一座博物馆。如《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中说：“张謇创办我国第一个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苑，从此开始了中国近代博物馆的新篇章”¹。南通博物苑是张謇以个人身份创办的，因此就性质而言，属于私人博物馆。中国第一座国有官办博物馆一般认为是1912年由蔡元培主持创办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由于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时间较长，直到1926年才正式开馆。因此也有人认为第一座国有博物馆是1913年开始创办，次年正式开放的古物陈列所。

实际上早在1876年洋务运动期间，京师同文馆（以下简称“同文馆”）内已经创办了中国的第一座博物馆，这是中国的第一座国有官办博物馆。由于相关史料匮乏，博物馆界内外对其知之甚少。如《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中国博物馆史》²等有关博物馆史的重要著作中均未见相关记述。笔者就相关史料对其事实试做钩沉，以就教于同人。

一 京师同文馆建立博物馆之可能性

京师同文馆是京师大学堂以及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点。其是在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同样如此，近代博物馆诞生于西方，中国的博物馆也是学习和接受西方文化的结果。京师同文馆是19世纪后半叶中国与西方社会在思想文化、科学教育等领域交流互动的窗口，中国最早的博物馆诞生在京师同文馆有其可能性也有着必然性。

1. 社会背景及京师同文馆的设立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不论是来自外部列强入侵，还是来自内部太平天国起义，都对清政府的统治造成了重大威胁。为了挽救危亡之势，以“自强”为名，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工业生产方式等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在统治者内部逐渐兴起。举办新式教育、创办新式学校是洋务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创办同文馆更直接的原因是，由于中西方交往越来越多，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中外交往多有隔阂。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放程度进一步加强。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其中第五十款的三项为（1）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字书写；（2）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俟中国选派学生学习英文，英语熟习即不用配送汉文。（3）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此次定约，汉、英文书详细较对无讹，亦照此例。”这一款更是使清政府设立语言学校、培养翻译人才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

1861年恭亲王奕訢奏议，从上海、广州等地通晓外语的商人中选派人员来京充当老师、挑选八旗幼童培养外语人才。但一时并未觅得合适人选，后来经人介绍聘得英国人包尔腾（Burdon）担任英语老师，1862年3月同文馆正式成立。当时仅设英文馆，学生只有10名。次年3月设法文馆、俄文馆。后来又相继添设了德文馆和东文馆。同文馆设立之初仅是一个培养翻译人才的外语学校，是总理衙门的附属机关³。1866年奕訢又提议设天文、算学馆，这一方案引起了以倭仁为首的保守派的强烈反对，经过半年多的激烈争论，以保守派

1 王宏钧：《中国博物馆学基础》，第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2 包遵彭：《中国博物馆史》，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64年。

3 吴宜显：《京师同文馆史略》，载于朱有瓚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第190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

的失败告终，天文、算学馆才得以设立。天文、算学馆的设立对于京师同文馆的发展极为重要，使其得以向综合性大学的方向迈进。

2. 与博物馆有关的设备和机构

自 1867 年天文、算学馆设立之后，尤其是在 1869 年丁韪良担任总教习之后，京师同文馆规模逐渐扩大。据当年的《同文馆题名录》记载，当时所开设的课程有英文、法文、俄文、德文、汉文算学、洋文天文、洋文算学、格物测算、公法学、汉文化学和医学等。经过数年发展，同文馆已成为一个文理兼备的学校，无论是组织管理还是教学上都具有近代欧美高等学校的特点¹。

随着同文馆的发展，一些现代化的辅助教学设施也相继设立。如 1873 年同文馆附设印刷所，备有中体与罗马体活字印刷机各一台，手摇印刷机七部；同文馆和总理衙门印件都由其印刷²。这里的印刷设备是相当先进的，丁韪良在《同文馆记》中称，“其设立后便代替了当时武英殿的皇家印刷所”³。1876 年设立化学实验室。1888 年增设格物馆，专设格物一席，由英文教习欧礼斐（C.H.Oliver）讲授物理知识，同时设物理实验室⁴。同年建造观星台一所，“其上设仪器、顶盖四面旋转，高约五丈。凡有关天象者，教习即率馆生登之，以器窥测”。⁵同文馆的藏书阁藏有汉洋各类书籍，总理衙门常将外国进献图书拨交同文馆以充实藏书⁶。1896 年藏书阁藏有汉文经籍 800 本、洋文 1900 本，汉文算学等书 1000 本⁷。这些新式的教学设施和机构的建立，极大地提高了同文馆的教学能力，使之成为当时中国最为先进的新式学堂。当时西方高校多设有博物馆并十分重视博物馆在教学中的作用。同文馆相继建立的实验室、天文台等也是受西方先进教育模式影响的结果，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作为重要教辅机构的博物馆也就毫无缺席的理由了！

3. 与博物馆相关的京师同文馆师生

中国的第一座博物馆为什么会诞生在京师同文馆，究其原因取决于人的因素，这里聚集了一大批远见卓识之才，同文馆的师生多与博物馆有着深厚的因缘，主要有丁韪良、德贞、徐继畲、斌椿、张德彝等人。

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字冠西，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1850 年受美国长老会派遣来华传教，1916 年在北京去世，在华活动长达 66 年。其参与了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是对中国近代一位比较有影响的西方传教士。丁韪良担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长达 60 余年，对于同文馆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人物。同文馆的博物馆便是在丁韪良任总教习期间建立的，这与他的经历和眼界是密不可分的。1863 年丁韪良从宁波来北京传教，1864 年他在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的资助下⁸，开办了一所名为“崇实馆”的教会学校。此后他多次向差会提议要求增派师资，及在校内附设小型博物馆，但由于未得

1 王维俭：《丁韪良和京师同文馆》，《中山大学学报》，1984 年第 2 期。

2 毕乃德著，傅任敢译：《同文馆考》，原刊于《中华教育界》第二十三卷第二期（1935 年）。前揭《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第 204 页。

3 丁韪良著，傅任敢编译：《同文馆记》，原刊于《教育杂志》第二十七卷、第四号。前揭《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第 163 页。

4 陶亚萍、韩礼刚：《京师同文馆中的物理学教育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汉文版）》，2005 年第 3 期。

5 《同文馆题名录》光绪十二年（1896）刊，前揭《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第 157、158 页。

6 《同治十三年十月十二日总理衙门事务奕诉等片》，前揭《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第 155 页。

7 《同文馆题名录》光绪十二年（1896）刊，前揭《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第 157 页。

8 司马富、费正清、布鲁纳编，陈绎译：《赫德与中国早期现代化：赫德日记（1863～1866）》，第 239 页，中国海关出版社，2005 年。

到差会的重视而没能实施¹。

丁韪良于1876年担任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博物院院长(该博物馆名称为“上海博物院”)²。该会的前身是寓居上海的英美外侨裨治文(Bridgman, E. C.)、艾约瑟(Edkins, J.)、卫三畏(Williams, S. W.)、雒魏林(Lockhart, W.)等人于1857年9月24日组建的上海文理学会。次年,加盟英国皇家亚洲文会,遂更名为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简称亚洲文会)。亚洲文会是一个重要文化机构,其对中国的自然、人文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深入广泛的调查。丁韪良长期(1864~1896)为亚洲文会的名誉会员³,也是该会的领导成员之一。亚洲文会成立之初就将建博物馆作为其重要目标,博物院于1874年3月25日正式成立。其收藏广泛,包括中国陶器、青铜器、少数民族服装、甲骨、碑刻、砖石、珠宝、古玩、头盔、钱币等。不仅藏品丰富,亦经常举办各类展览向公众免费开放,还与欧美各大博物馆进行藏品和学术交流活动。可以说,亚洲文会博物院的规模和水平在当时中国境内是首屈一指的。

丁韪良在总结其以科学技术辅助传教的经验时曾提出四点建议:第一,编写科学教科书时,“对于宗教,既不应不明智地牵强附会,也不应被排除在那些教科书之外”;第二,每个差会建一所博物馆,“以展示西方的技术和科学”;第三,出版系列科学启蒙读物时“以科学为矢,射宗教之的”;第四,对传教士配备“像魔灯、留声机、光学仪器、电学器具和蒸汽机械等一样的科学玩具”⁴。

由此可见丁韪良对于博物馆这样一种科学知识的传播机构是十分重视的,可谓处处留心、时时在意。虽然这是建立在其科学辅助传教的观念之上,但是他的这些行为对于当时中国科学知识和博物馆观念传播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德贞(John Dudgeon, 1837~1901),原为英国伦敦会医学传教士,1863年获得格拉斯哥大学医学硕士后受教会派遣来华从事医学传教。1871年,德贞受总理衙门聘请,出任同文馆第一任医学与生理学教习。德贞在同文馆教授生理学、解剖学等西医课程,这被医学史界认为是中国近代新医学教育的开端。德贞在其翻译的《全体通考》中,介绍相关解剖学知识时特别指出:西方解剖学的发展得益于各国建立的“动物”博物院,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解剖博物馆”,世界上最精的莫不如“英国的狼得兄弟二人所创”⁵,形象展示人体构造,促进了西方解剖学的发展⁶。可见德贞对博物馆在近代医学发展中的作用也极为重视。

于1867~1869年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的徐继畲,是近代中国最早开眼看世界的先进知识分子之一,他在关注西方、学习西方政治风俗、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关注了西方的博物馆。在其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完稿的《瀛环志略》中即有关于博物馆的记述,其称之为“古玩库”。还有称为“军器局”和“军功厂”⁷的机构,

1 邱笑飞:《传教士丁韪良的中西沟通》,《世界博览》,2008年第16期。

2 王毅:《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研究》,第59页,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

3 前揭《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研究》,第38页。

4 见 *The Chinese Recorder*, pp.111~116, March, 1897. 转引自孙邦华:《简论丁韪良》,《史林》,1999年第4期。

5 即亨特解剖学博物馆。德贞译著《全体通考》一部分底稿《骨论》的作者为荷尔敦。荷尔敦(1868~1884)是19世纪末期英国解剖学和外科学界的权威人物,曾任亨特解剖博物馆主席,理事会委员。见高晞:《〈全体通考〉底本之研究》,《中华医学会医史学分会第11届3次学术年会论文集》,2007年。

6 高晞:《“解剖学”中文译名的由来与确定——以德贞〈全体通考〉为中心》,《历史研究》,2008年第6期。

7 徐继畲:《瀛环志略》,第143、217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

有人认为其指的就是军事博物馆¹。

斌椿和张德彝作为同文馆师生，也是最早将其在海外所见博物馆记述下来的中国人。斌椿自1864年起，应赫德之邀到海关总税务司办理文案，后与丁韪良多有往来，1867年年初担任同文馆“西学总管”，直至1871年去世。张德彝是同文馆开办之初的第一批学生，入学三年后总署大考，奏保八品官。1884年任同文馆英文副教习，后来任光绪帝的外语老师，“侍德宗读英文，赐免跪拜”。²斌椿同其子广英及同文馆三名学生凤仪、张德彝、彦慧，于同治五年（1886年）游历了欧洲11国。斌椿在《乘槎笔记》中记述了他所看到的各类博物馆，如“画院”、“生灵苑”、“君主行宫”以及“玻璃巨屋……内贮名画无数”。张德彝在《航海述奇》将其所见到的博物馆称为“集宝楼”、“积骨楼”、“白骨园”、“生灵园”、“集奇馆”、“万种园”、“画阁”、“集字院”等，计有十余处。

此外还有同文馆德文馆学生治格。他因成绩优异于1896年被派赴驻德使馆工作学习。1898年回国，参加同文馆考试³，成绩合格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德文翻译官⁴。民国初年北洋政府决定成立古物陈列所，内务部委派时任热河都统的治格将承德及沈阳两地行宫内文物运往北京，1914年古物陈列所成立，又任命其为第一任所长⁵。1915年京师同文馆联合上海、广州同文馆举办了一次颇为隆重的校友会，治格在签到表上留下的职务为都护副使⁶，或许当时他已不再担任古物陈列所的所长了。

纵观同文馆的这些师生，丁韪良对于博物馆的那份执著自不必说，德贞作为医学教习将博物馆的重要性编入教材，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徐继畲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对西方的博物馆有所关注，而斌椿和张德彝等人则可以将其在海外参观博物馆的亲身感受讲述给同文馆师生及相关人员。可以说同文馆已为中国博物馆的诞生准备好了最肥沃的土壤。至于治格能够并愿意担任古物陈列所首任所长这一重要职位，或许和同文馆这种环境对其早年的培养和熏陶是分不开的。

二 京师同文馆博物馆建立之情形

由于时间久远，京师同文馆所建的博物馆已经迷失在历史深处。然而雁过留声，我们还是能够追寻一些关于它的踪迹。

国内外学者提及京师同文馆博物馆的文章其实也不少，国内学者如王维俭⁷、段琦⁸、何大进⁹、陈向阳¹⁰、孙

1 王宏均：《中国博物馆学基础》，第7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2 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份子考察西方的历史》，第91页，中华书局，1985年。

3 《同文馆题名录》光绪十四年（1898）刊，前揭《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第60页。

4 李文杰：《总理衙门的翻译官》，《档案历史》2011年第2期。

5 段勇：《古物陈列所的兴衰及其历史地位述评》，《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5期。

6 在签到表治格留下的其他信息为：字，鹤青；年岁，48；籍贯，北京，蒙古；住址，总布胡同。《京师、上海、广州同文馆部分学生离校后情况一览表》，《京师同文馆校友会第一次报告书》，第28～44页。前揭《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第283页。

7 王维俭：《丁韪良和京师同文馆》，《中山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

8 段琦：《丁韪良与西学东渐》，《世界宗教研究》2006年第1期。

9 何大进：《丁韪良与京师同文馆》，《北方论丛》2005年第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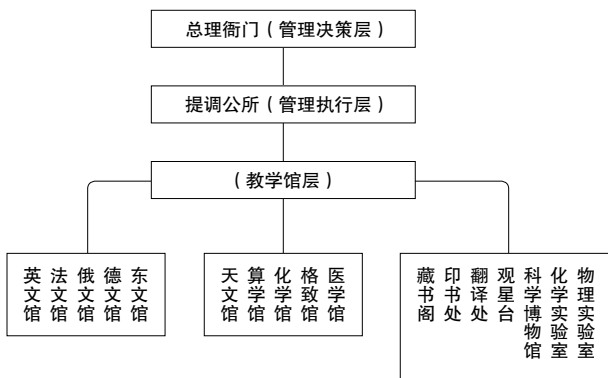
10 陈向阳：《京师同文馆制度分析》，《纪念〈教育史研究〉创刊二十周年论文集（3）——中国教育制度史研究》，第542页，2009年。

邦华¹、王立新²、郝平³等人,国外学者如 Peter Duus⁴、Ralph Covell⁵、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⁶等人。但都语焉不详,诸如“同文馆建了实验室和博物馆”或“同文馆于某某年建了博物馆”之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博物馆史的条目下,有这样一句话:“中国人创办博物馆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主要是为配合学习西方自然科学技术知识而设立的。1876年京师同文馆首先设博物馆。”⁷也仅此一句。那么,同文馆的博物馆确实存在吗?其具体情况又如何呢?

从上文所述可见,同文馆具有孕育博物馆的各种客观条件,然而这并不能说明同文馆已建成了博物馆。我们来看更直接的证据。毕乃德的《同文馆考》算是较早研究京师同文馆的文章了。毕乃德(1906~2001)是美国康乃尔大学教授,著名汉学家,其专治中国近代教育史。这篇文章写于1935年,其中提及同文馆博物馆。毕乃德的根据是丁冠西儿子 Newell Martin 提供的1888年《同文馆题名录》(英文版),其上有丁冠西手批⁸。同样是美国传教士的 Ralph Covell 著有《丁韪良:中国进步的先驱》一书,这是一部传记性的专著,他的依

据是1879年的《同文馆题名录》。此外,在丁韪良所撰的回忆录《花甲忆记》中曾提及,他将一台发报机放在同文馆的博物馆内,对此傅任敢⁹及沈弘等人¹⁰均译为“陈列室”。查对丁韪良原作,其赫然写着“*They are now stored as lumber in the museum of the college*”¹¹。《同文馆题名录》是同文馆向总理衙门的述职报告,其与丁韪良的著述都是同文馆最为可信的史料,由此可见同文馆博物馆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博物馆在同文馆组织结构中的位置如《京师同文馆组织结构图》¹²所示)。

博物馆建于1876年,也没有争议。同文馆建于1862年,至1876年经过十五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学科门类多样、设施设备齐全的新型高等学府。而且这一时期正值同光中兴的鼎盛时期,洋务运动蓬勃发展,作为洋务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同文馆,获得政府在资金上和政策上的支持自然是比较容易的。



京师同文馆组织结构图

1 孙邦华:《简论丁韪良》,《史林》1999年第4期。
2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第26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
3 郝平:《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第8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4 Peter Duus: *Science And Salvation In China :The Life And Work of W. A. P.Martin(1827~1916)*, p.27. Edited by Kwang-Ching Liu: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 Papers from Harvard Seminar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5 Ralph Covell: *W.A.Martin Pioneer of Progress in China*, Christian Press, 1987, p.180.
6 前揭《同文馆考》,第204页。
7 《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第749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
8 前揭《同文馆考》,第209、212页,注释13和26。
9 前揭《同文馆记》,第172页。
10 丁韪良著,沈弘、恽文捷、郝田虎译:《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第20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11 W.A.P. Martin: *A Cycle of Cathay or China, South and North, With Personal Reminiscences*, Edinburgh and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and Ferrier, 1896, p.300.
12 此图根据陈向阳先生《京师同文馆组织结构图谱》绘制,其所制图谱中无博物馆。见陈向阳:《晚清京师同文馆组织研究》,第152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博物馆建于何处？同文馆与总理衙门相连，同文馆位于东边，馆址位于现在的东堂子胡同。其建筑原为军机大臣赛尚阿的府邸，同文馆的房屋基本上是传统的四合院，全馆共有七处这样的院落。其中厢房和一些低矮的房屋是馆役和住宿学生的寝室，正房就是学馆和办公的场所¹。博物馆就位于这些建筑之中，博物馆的规模，可能也不会很大，也就一两间屋子而已。

博物馆的藏品以及展览。同文馆的设立是为了学习西方的语言文字，以及先进的科学技术。即通过学习西人“推算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钩河摘洛之方”²以实现国家的富强。博物馆设立的初衷与物理实验室、化学实验室、观星台、藏书阁等一样，都是辅助教学的机构。其藏品多为新式的机器（也包括模型）、矿石、动植物以及医学标本等。这些藏品多从外国采购或来自外国友人捐赠。其展览也不过是将这些藏品按一定的学科或知识体系分类陈列，类似于早期的库房式陈列。博物馆主要是供同文馆学生参观学习，一些直观性、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可能都是在博物馆进行教授的。其并非是一个对普通大众开放的公共博物馆，当然也不排除接待外国友人或一些重要的客人，称其为高校博物馆应当比较恰当。关于同文馆博物馆的这些基本情况皆可从相关传记材料或史料中推而知之³。

“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拳乱，联军入京，两宫西狩，同文馆师生全体解散。”⁴自此同文馆走完了它四十年的风雨历程，1902年正式并入新成立的京师大学堂⁵。京师大学堂也有建博物馆的计划⁶，同文馆博物馆顺利并入并为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三 京师同文馆博物馆建立之意义

京师同文馆博物馆建于1876年，其时间之早可以说是开创了我国近代博物馆的先河。或许在规模上同文馆的博物馆还无法与1905年创建的南通博物苑相比，但是同文馆的博物馆是一个确实存在的博物馆，其在此前已存在了近30年。京师同文馆博物馆诞生于那个内忧外患的时代，其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历史意义，也不可避免的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京师同文馆博物馆是我国最早的国有博物馆。相比之下，南通博物苑为张謇以其个人的身份所办，在这一点上同文馆博物馆则完全是国有官办性质。同文馆直属于总理衙门，总管大臣多由总理衙门大臣兼任，如徐继畲、奕訢、奕劻、宝鋆等，多是权重一时的亲王、要员。总教习丁韪良也于1885年被赏三品衔，1898

1 前揭《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第203、207、208页。

2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六。前揭《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第13、14页。

3 比如丁韪良在曾说他将一个从美国带回来的电报机放在了博物馆；“格致化学两馆现存机器矿石等物，素皆购自外洋。”《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正月奉堂谕》；同文馆藏书阁曾接受法国、美国有关机构和个人捐赠的书籍。《同治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1872.11.23）总理各国事务奕訢》。前揭《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第148、155、156页。

4 吴宣易：《京师同文馆史略》，《读书月刊》1833年第二卷。前揭《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第191页。

5 光绪帝：《著将同文馆归入京师大学堂谕》。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第53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

6 《大学堂章程》总章的第七节说：“泰西各种实学，多借实验始能发明，故仪器为学堂必须之事。各国都会，率皆有博物院，搜集各种有用器物，陈设其中，以备学者观摩，事半功倍。今亦宜仿其意，设一仪器院，集合天算、声光、化电、农矿、机器制造、动植物各种学问应用之仪器，咸储院中，以为实力考求之助。”《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四日大学堂章程（1898年7月2日）》，载于王学珍，张万仓（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861～1948）》，第77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年又得二品官衔。同文馆包括建博物馆在内的各项事业经费皆由总理衙门拨发。我们通常认为的国有博物馆即1912年开始筹办的国立历史博物馆或古物陈列所，与其相比同文馆博物馆要早近40年。其比日本最早的博物馆还要早，日本最早的博物馆是于1878年在上野公园动工兴建的帝室博物馆¹，即现在的东京国立博物馆。

京师同文馆博物馆是我国最早的高校博物馆。同文馆是一个为培养外语人才及了解西方科技知识的新型人才而设立的教育机构，其具有高等教育的性质，在我国新式教育的许多方面都具有开创性。赫德、丁韪良等外国人很自然地将之看作是一所大学。同文馆的博物馆也是为了培养新式人才的目的而设立的，Peter Duus在他的文章中称其为“Science Museum”，应该是符合事实的。其是学生学习自然科学知识的一种辅助教学机构。这一点上其与南通博物苑是一致的，南通博物苑的设立也是为了满足南通师范学院学生学习的需要，但其建馆时间之早却是南通博物苑远远不及的。

诞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的同文馆，交织着诸多当时社会的阴影。同文馆的博物馆，也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表现出鲜明的过渡阶段的性质。应该说同文馆博物馆的具体创建得益于美国人丁韪良的建议和努力实践。但其与当时的徐家汇博物院、上海博物院等完全由外国人开办的博物馆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京师同文馆是由以奕訢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员主持创办的，其始终在清政府和总理衙门的管理和监督下运行。同文馆中外国教师很多，个别外国人对同文馆的发展影响很大，如丁韪良、赫德。但他们都是同文馆聘用的，入职前还要经过考试，在工作中也得接受清政府的管理，比如禁止在馆内传教、禁止在课堂上讲授圣经等。此外，丁韪良所任的总教习一职并非他自诩及某些人认为的校长，就其职责来看也就相当于教务处处长²。作为同文馆监察官的赫德，主要任务是为同文馆推荐洋教师，并从其掌管的海关总税务司的收入中支付外籍教师薪俸。由此可见同文馆的管理权和决策权完全在清政府手中。丁韪良建立印刷所、实验室、观星台的建议必须得到奕訢、文祥等总理衙门主管领导的同意才能实施。博物馆的创办也是如此，只有得到总理衙门主管领导的同意和支持才能付诸行动。

以京师同文馆为主的新式教育是洋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它并没能挽救清政府日渐颓败的局势，但其对西方科学知识的传播与普及，以及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博物馆有幸诞生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是洋务运动和中国现代化的成果之一；是不甘落后的中国人学习西方科学知识、以图自强的见证。当然关于同文馆博物馆的具体情况史料所见有限，还有待进一步发掘研究。但其曾经存在并为同文馆的教学及科学知识的普及发挥过一定的作用，其开创中国博物馆事业先河之功是应该得到承认的。

[作者单位：北京翰海拍卖公司佛像部]

(责任编辑：赵中男)

1 茂木雅博：《日本的博物馆——成立的经过与现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1年，总第15～16期。

2 高慧斌：《京师同文馆“馆政”与“掌教”制度研究》，《教育史研究》2008年第4期。